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季羨林文集

第四卷

中印文化关系

第四卷

中印文化关系

季羨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辑:李 铮
本卷责任编辑:刘年珍
本卷责任校对:吴明华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羡林文集

JI XIANLIN WENJI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7 插页:8 字数:420,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1926-2/Z·4

定价:50.00元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熊向东 李 铮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 铮 张光璘 季羨林 胡乃羽

段 晴 郭良鋈 秦光杰 钱文忠

黄宝生 蒋忠新 熊向东

策 划

杨鑫福 吴明华

责任编辑

吴明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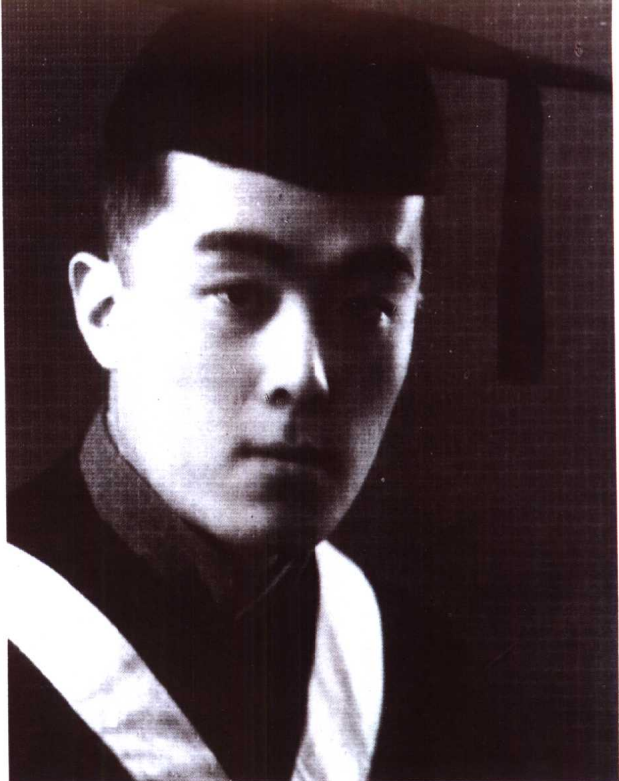
美术编辑

刘良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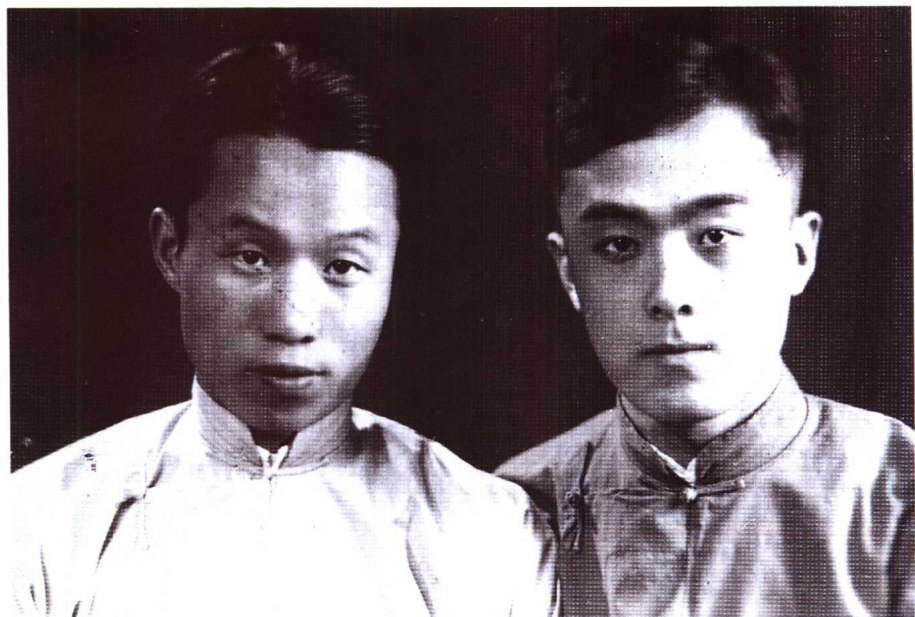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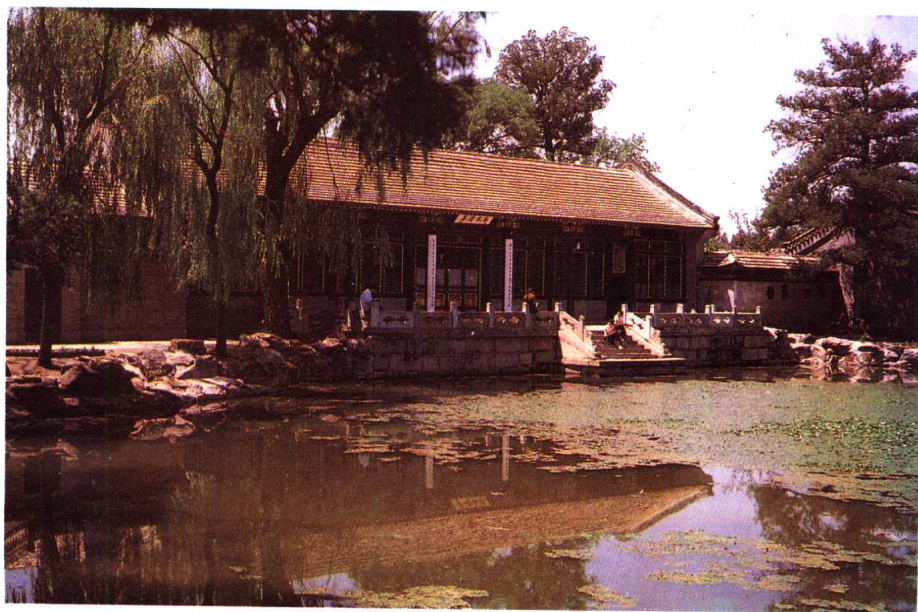
1934 年清华大学
毕业留影。



1934 年夏与高中同学徐家存先生合影,右为作者。



1931—1934 年，作者在清华大学学习，此为清华大学校景之一——清华园。



清华大学校景之一——水木清华。

出版说明

《季羨林文集》是 1992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羨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 第一卷:散文(一);
- 第二卷:散文(二);
-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 第七卷:佛教;
-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 第九卷:糖史(一);
- 第十卷:糖史(二);
-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 1947 年至 1991 年撰写的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论著共 17 篇。其中《玄奘与〈大唐西域记〉》一文,是作者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所写的“前言”,实际上是一篇长达 10 万字的论文;《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 年 12 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其余则均曾在报刊上或作者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 年,人民出版社)、《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 年 5 月,三联书店)和《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1990 年 6 月,江西人民出版社)等书中发表。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2 年 3 月

目 录

期刊简介:《中印研究》·····	1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	4
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	9
论梵文 <i>ṣṭ</i> 的音译 ·····	12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	54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	86
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 作用·····	138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	155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序·····	164
印度文学在中国·····	171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前言·····	189
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问题的补遗·····	199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	203
对《丝》、《纸》两篇文章的补正 ·····	339
关于神韵·····	342
《关于神韵》一文的补遗·····	352
中印文化交流史·····	355

期刊简介：《中印研究》

师觉月(P. C. Bagchi)主编

印度加尔各答出版

过去中国同印度文化关系的密切,已经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用不着再来讨论了。但一说到中印文化关系,我就感觉到这关系有点奇怪,因为这几乎是一面倒的;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印度文化源源流到中国来,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中国文化却差不多根本没有流到印度去,自然更谈不到影响。今年春天印度政府派师觉月先生到北大来讲学,胡适之先生在第一次公开讲演时的介绍辞中曾谈到这现象。师觉月先生在答辞中曾说到中国思想也曾影响了印度中世的神秘主义。但他也就只能找到这一个例子,再多恐怕就很难找到了。

但中国对印度也并不是全没贡献。产生在印度的佛教几乎可以说是搬家到中国来了,印度已经佚失的佛经很多都完整地保存在中译的大藏经里。中国历史里关于印度和西域的记载,中国高僧到印度去求学求法的记录,现在都成了研究印度历史的无上宝典。印度人是没有时间和历史观念的,这我们都知道。倘若没有中国历史里这些记载和中国高僧这些记录,印度历史恐怕比现在还要充满了暗雾,中亚古代史地的研究也无从着手。只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酬答印度对我们文化的功绩了。

这些材料虽然对中印文化关系这样重要,但在过去在这方面研究的几乎都是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中国学者很少注意这方面,

印度更没有人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但现在印度却有人起来提倡这方面的研究了。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院院长、现在北大讲学的师觉月先生。他在 1945 年创办了《中印研究》(Sino-Indian Studies),是季刊,每年一、四、七、十,四个月出版。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关于印度历史和文化的材料,翻译印度已经佚失而在中国译文里还保存着的典籍,此外当然也涉及到中印关系的各方面。根据我上面所谈的,这刊物本身已经有很大的意义,尤其是当中印两方面都正在努力恢复以前的文化关系的时候,更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中印研究》到现在一共出了一卷半,就是第一卷的第一、二、三、四期,第二卷的第一、二期。内容非常充实。我现在把重要的论文题目写在下面。

第一卷第一期:

P. C. Bagchi,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m in China
(中国初期佛教)

P. C. Bagchi, Vajragarbhatantrarājasūtra, a new work of King
Indrabodhi—Study and translation
(最上大乘金刚大教宝王经)

第一卷第二期:

P. C. Bagchi, Sino Indian Relations(中印关系)
The Period of the United Empires(I)

Chou Ta - fu, Three Buddhist Hymns (Restored into Sanskrit from
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中文三佛教赞歌——还原为梵文)

第一卷第三期:

Lo Ch'ang-pei, Indian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Phonology
(罗常培:印度对中国音韵学之影响)

N. A. Sastri, Harivarman on Vaiśāḍya

P. C. Bagchi, Bodhisattva - śīla of Śubhākarasiṃha (无畏三藏禅要与翻译)

第一卷第四期:

P. C. Bagchi, Sino - Indian Relations(中印关系)

The Period of the United Empires(II)

第二卷第一期:

P. C. Bagchi, Kipin and Kashmir(罽宾与迦湿弥罗)

第二卷第二期:

S. Levi, Ptolemaic, le Niddesa et la Brhatkatha(英译)

从上面六期的论文题目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这刊物过去的成绩和将来的趋势。里面有好几篇中国学者的论文,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印学者能像这样合作下去,也诚恳地希望这刊物能把这合作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起来。

1947年6月3日于北大

从中印文化关系 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中国立国几千年，在历史上同许多别的民族都发生过关系。仔细分析起来，这关系非常复杂。有的民族同我们发生过战争，有的同我们来往贸易过，有的派过使臣到中国来，有时候我们也派使臣到别的国家去。说到同中国发生关系的民族的种类和数目，我们只知道很多，到现在还没能研究清楚究竟有多少，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在这样复杂的民族里，这样复杂的关系里，有一个民族同我们发生的关系比较单纯，但时间却延长得最久，影响也最大，这个民族就是印度，同我们发生的只是文化关系。

我说是关系比较单纯，是只就关系的种类说的。因为印度几乎同我们只发生过文化关系，所以我说是单纯。但在这单纯的文化关系里，头绪却异常的复杂。想把这头绪弄清楚，绝不是这样一篇短文就可以办得到的。即便我们写上几册厚的专著，也依然只能谈一个大概。所以我在下面只能把几项最重要的粗略地说一下：

第一，宗教方面的关系。有些人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非常淡薄。在上古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也创造了许多很美的神话。但像许多民族那样有具体的宗教，中国则望尘莫及。我觉得这话非常有道理。到了汉朝，中国才渐渐创造了一个宗教，就是后来的道教。但由于种种原因，道教在中国的影响和势力始终不太大。真正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社会的各阶层，把

宗教意识带给中国人的是从印度输入到中国来的佛教。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用不着我在这里再详细讨论。我现在只想提出一点来说一说,也许有很多人还不知道。我上面说到道教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宗教,但现在的道教却已经不能说是纯粹是中国的了。在最初,道教里的成分或者还纯粹一点。自从佛教输入以后,一般人都震惊于佛教哲学的深奥、幻想的丰富,于是佛教不久就风靡一时。道教徒看了,当然觉得很恐慌,佛教对他们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立刻起来对佛教加以攻击。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造种种谣言,但结果却没有用,佛教仍是一天天扩大起来。他们看了用武力不行,于是变更了战略,同佛教讲交情,认亲戚,他们说他们的祖宗老子出关没有回来,原来到印度去了,在印度摇身一变,就变成释迦牟尼如来佛。道教同佛教的教主原来只是一个人。他们想把佛教徒攀成亲戚,但佛教徒方面却没有什么反响。他们根本没有意思认这门新亲戚。道教徒没了办法,就从佛经里面偷东西。道藏里的《真诰》,就有好多条是从《四十二章经》偷来的。他们甚至还进一步的把他们的神政府按照佛教的格式改组了一下,结果就成了现在的道教。归纳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两个大宗教,一个是直接来自印度,一个也受了印度的影响。可以想见,印度对中国宗教影响之大了。

第二,哲学方面的关系。宗教同哲学有时候很难分得开,尤其是在印度。随了佛教,印度的哲学也流传到中国来。在汉魏六朝时代,印度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到了宋朝这影响才显著起来。我们都知道,宋朝是所谓理学时代。有名的大思想家像程子朱子都自认是孔子的信徒,得了孔子的正传。倘若当时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哲学受了佛家的影响,他们一定勃然大怒。他们都以道统自任,都是拼命排斥异端,想在死后到圣庙里去吃冷猪肉的,怎能受了佛家的影响呢?但事实却是非常冷酷的。

他们的哲学里真正有佛家的成分,这是每个现代学者都会承认的。他们在少年的时候都曾研究过佛典,后来虽然转了方向,但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却仍然受了佛典的影响。也许他们自己也并非不知道,只是不好意思直说而已。无论怎样,印度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里生了根,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了。

第三,文学方面的影响。在世界所有的民族中间,印度民族大概可以算是最富于幻想的了。就由于他们有这本领,所产生在印度的寓言和童话非常多,这些寓言和童话从印度出发,走遍了世界,也到了中国来,而且给幻想很贫乏的中国文学带来很多的新材料。在长篇小说方面,我只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游记》,一个是《封神榜》。西游记许多妖怪的故事来自印度固然是尽人皆知的了,连孙悟空也不是土产的猴王,他的前身大概就是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里的那个猴子。《封神榜》里许多想入非非的斗法的故事也都不是我们中国人可以创造出来的,来源也同样是印度。在短篇小说方面,我只想提醒大家看唐人的短篇小说。在唐人的短篇小说里,有的简直直抄印度的故事,有的故事虽然是中国的,但里面却杂入了很多的印度成分,像王度的《古镜记》,沈既济的《枕中记》,沈亚之的《秦梦记》都是。一个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出来游行,狐狸变成太太,还有幻术等等都是在中国短篇小说里极常见的事情,这些也是受外来的影响。再说到戏,印度古代的戏剧也曾影响到中国戏剧,可惜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太不充分。详情如何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来说明。

第四,医学方面的关系。现在中国的旧医学,我们自称为“国医”。有些国粹家看到欧洲医学的努力一天天大起来,我们的本位文化眼看渐渐失掉了光彩,恐怕会有一天全部消灭,他们于是大声疾呼,要提倡“国医”。我对这样吉诃德式的英雄向来是有敬意的,但我却觉得这“国医”的“国”字有问题。因为佛教输入以前的中国

医学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不十分清楚,神农老人家白白尝过百草,可惜没留下著作,让后人无从猜起。现在一般人认为的“国医”却确实不是国货,它的来源也多半是印度。我们平常只知道,我们从印度译过来许多佛经,其实除了佛典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书也翻译了过来。现在这些书虽然都已经失传了,但在《隋书经籍志》里还可以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譬如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西录波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乾陀利治鬼方,等等,来源都是印度。连歧伯经的歧伯似乎都不是中国人名。所以中国现在的“国医”实在只是印度国的医。我并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我只叙述事实。事实是这样,我也只好这样说了。

第五,语言方面的关系。在语言的发展上,确有两种在性质上绝对不相同的语言而可以互相影响的。阿拉伯文同波斯文就是个好例子,中国文同梵文也属于这一类。我并不是说梵文影响了中文的文法构造——这当然也并非绝不可能,但这种例子究竟很少。我们顶多也不过可以说,由于佛经的翻译,中国文的句法多少受了点影响,受影响最明显而例子也最多的就是字汇方面。换句话说,就是中文从梵文里直接地或间接地借过来许多字。有些字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假借字的,譬如佛、菩萨、沙门、比丘、僧之类,用不着我们再来多说。但也有些字,我们已经不知道它是外来的假借字了,譬如玻璃、琉璃之类。山东俗语里的“一刹”也是梵文字,就是刹那的缩写。这两种例子我们都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我预备另写文章来讨论这问题,这里不再赘述了。

第六,雕塑方面的关系。在这里,我先把话说回去,说到古代的希腊。我们都知道,希腊人在雕塑方面的成功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赶不上的。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希腊雕塑艺术也传到东方来,同印度艺术混合了,成了所谓犍陀罗艺术。这犍陀罗艺